



巴尔扎克选集

中短篇小说选

UNE PAGE IMPRIMÉE, CORRIGÉE PAR BALZAC
Giraudon

巴尔扎克选集

中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Baerzhak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436,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7}{8}$ 插页 14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100

ISBN 7-02-000813-5/I·814 定价 10.00 元

译 本 序

如果把巴尔扎克(1799—1850)的《人间喜剧》比作气势宏伟的大厦,那么,那一系列遐迩闻名的长篇(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古物陈列室》、《贝姨》、《农民》,等等),就仿佛是巨大的柱石支撑着这座辉煌的建筑,体现出雄浑的主调;而中短篇小说,则有如一道旁门、一扇彩窗、一角飞檐、一方雕饰。如果将《人间喜剧》比作气象万千的美景,那么,其中的长篇就如奇峰幽谷,密林静湖;而中短篇则象是一座亭榭,一棵古树,一块怪石,一株异草。前者令人叹为观止,后者亦使人击节赞赏。

巴尔扎克擅长把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对现实的精细体察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艺术开掘,在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描绘中融进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意识,从而形成了他博大深邃而又精微质朴的独特风格。中短篇小说受到篇幅制约,巴尔扎克又不以构思巧妙见长,但在这个领域里,他依然发挥了他的优势,自觉地将艺术的概括依附于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

和理解，使作品同样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并蕴蓄着耐人寻味的思想力量。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中短篇则显得更加自由多样，不拘一格，展示了作家多方面的才华。

为了使读者对作家的创作特色能有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力图选择在思想或风格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入选的小说，均完成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是巴尔扎克跃登文坛、创作力旺盛时期的作品。

二

“我们当诉讼代理人的，只看见同样的卑鄙心理翻来覆去地重演，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洗心革面；我们的事务所等于一个没法清除的阴沟。哼，我执行业务的期间，什么事都见过了！我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那些女儿理都没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父亲的偷盗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来杀死丈夫，使他们发疯或者变成白痴，为的要跟情人消消停停过一辈子。我也看到一些女人有心教儿子吃喝嫖赌，促短寿命，好让她的私生子多得一份家私。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

我常把《夏倍上校》里但尔维律师的这番道白，比作是《人间喜剧》的“节目单”或“说明书”，它所罗列的丑行败德，尽管

只是“喜剧”很小的一部分，但已十分怵目惊心，足以使人品略巴尔扎克揭示社会罪恶、尤其是金钱罪恶的非凡本领。

《夏倍上校》本身，就是一幕令人不寒而栗的惨剧。“死”而复生的夏倍上校与已经改嫁贵族的妻子之间的冲突，最终是围绕财产展开的。被误传为阵亡的夏倍落到了一贫如洗、衣不蔽体的狼狈境地，而鲸吞其全部“遗产”的伯爵夫人不但见死不救、分文不给，反而要求夏倍“用切实的方式”承认自己是欺世盗名的“小丑”、“骗子”，否则就以强力把他投入疯人院。金钱扭曲了灵魂，毒化了情感，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贪得无厌的财产占有欲，使伯爵夫人人性泯灭，冷酷残忍，不择手段地逼夫成疯，把正直高尚的夏倍上校变成了若痴若呆的“第七室第一百六十四号”。战场上能征善战、死里逃生的英雄，却无法逃脱金钱编织的人伦网。

人是尊严的。精神的屈辱给人造成的痛苦时常更甚于肉体的折磨，对人格的侮辱往往要比剥夺物质财富更加令人无法忍受。夏倍上校精神的崩溃，不仅在于他遭到了无情的掠夺，而更在于他被要求自己贬损自己的人格、甚至自己否定自己的存在。巴尔扎克独具慧眼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①的悲剧。

对摧残人性的社会的尖锐批判，和小说构成中的戏剧性因素，使《夏倍上校》在巴尔扎克的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人间喜剧》里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毫无疑问，揭露黑暗，展示丑恶，鞭笞物化的灵魂，控诉人性的毁灭，是巴尔扎克创作的基本趋向。这一明显的基调，使作家遭受了“不道德”的责难，甚至泰纳也认为他对“人类的丑处”有着“明目张胆的偏爱”。实际上，作家也在尽力寻找着善良，寻找着光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对照”（《〈人间喜剧〉前言》）。因而，在他的画廊里，我们看到了纯情痴心的少女，替天行道的神甫，良心圣洁的贵族，品德高尚的医生，探求真理的智者，富有献身精神的共和英雄，等等，等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道德理想。

在《无神论者望弥撒》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劳动者。挑水夫布尔雅一贫如洗，但为了成就大学生德斯普兰的事业，他默默地、不希冀任何回报地奉献了自己仅有的一切。与恶浊的社会氛围相对映，布尔雅的崇高精神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假如真有天堂的话，除了他还有什么人能上天堂呢？”也许我们可以责备巴尔扎克把道德的完美归之于宗教信仰的力量；但是，作家竟把这个普通劳动者的灵魂请进了先贤祠，使之与法兰西历史上的伟人们为伍，这难道不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实吗？

三

巴尔扎克总是以那么一种微妙复杂、难以尽言的笔调来抒写贵族的命运，几分同情，几分怨恼，几分敬重，几分调侃。历史的裁断与道德的评价相交叉，使作家于清醒中流露出惶

惑，但又未失却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

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几个以贵族为主人公的短篇，几乎都是围绕爱情婚姻故事展开的。尽管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情感的纠葛与阶级的处境紧密相连，却使一幕幕悲剧都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蕴含着较深的思想内容。

《苏镇舞会》发表于七月革命前夕的一八二九年，尚属巴尔扎克的试笔之作，但作家对复辟时期贵族尴尬地位的描写，已可谓入木三分。老贵族德·封丹纳伯爵对王室忠心耿耿，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十分实际。他让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与资产者新贵联姻，为的是弥补自己财力的空虚，表现出他对江河日下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三女爱米莉虽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其观念之陈腐既甚于兄姐，也甚于老父。决不屈尊下嫁的门阀之见酿成了她的婚姻悲剧，使她失去了爱情的幸福，也失去了她所追求的虚荣。而审时度势，善于顺应潮流，且有务实精神的贵族后裔马克西米利安，却成了政治舞台和经济生活中的佼佼者。巴尔扎克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嘲弄是辛辣的，对社会情势的把握是准确的。

《被遗弃的女人》(1832)的情调偏于哀婉。这篇小说创作于《高老头》之前，情节却是《高老头》的后续。鲍赛昂夫人在巴黎和诺曼底乡间的两次悲剧性“风流韵事”，既是对封建门第婚姻的控诉，也透露了贵族妇女不得不让位于资产者妇女的历史趋势。

人们以为，巴尔扎克擅长描写三十岁女性的成熟美，鲍赛昂夫人正是这类感情深沉、光采照人的典型之一。“巴黎女

后”的地位，使她具有高雅而傲慢的气度；不幸的婚姻，隐秘的痛苦，使她变得孤傲而内向；在婚外的恋情中，她又显得那么纯真而执著。小说以平庸卑俗的乡间贵族生活场景开篇，以加斯东男爵无法忍受乏味的婚姻而悲愤自尽结尾，渲染了加斯东与鲍赛昂夫人情感之炽热、之诚挚，从而更突出了鲍赛昂夫人对爱情、对人生、对社会的绝望。

鲍赛昂夫人两次遭到情人的遗弃，而两个情人的婚姻都是只有巨额陪嫁却没有爱情的婚姻。如果说，在《被遗弃的女人》中，巴尔扎克对封建的婚姻关系和金钱的诱惑力量同时展开了批判的话；那么，在两年后创作的《高老头》里，作家则把重心转向了后者。金钱的力量不仅夺走了鲍赛昂夫人的情人、迫使她含泪离开繁华的巴黎，而且把一批但斐纳式的资产阶级女性推上了舞台充任主角。巴尔扎克不无遗憾地写出了这一历史的变异。

《家族复仇》(1830)的题材，似乎应属于梅里美或斯丹达尔，但巴尔扎克写来也自成风格。家族世仇，是封建残余；科西嘉人的强悍性格，更强化了仇恨的残忍性和顽固性。一对年轻人以爱情的力量冲破家仇的阻隔，向封建意识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但青年夫妇敢于逃离家庭的藩篱，却无力摆脱经济拮据的缠绕，虽同心同德拼力工作，最终仍双双死于贫困。腐朽的传统观念与严酷的社会现实，这双重的罪恶制造了一出十九世纪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一箭双雕，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冥顽不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力量同时展开了批判。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巴托洛梅奥是拿破仑麾下的忠臣，而他女儿用来反对他的武器恰恰是拿破仑的《法典》。忠于拿破仑事业者未必能真正接受拿破仑的法律；而按照资产阶级法律行事的，却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求得生存的权利。作家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

四

对资产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在《人间喜剧》中占据核心地位。这里选择的若干篇什，如同全豹之一斑，能使我们从多方面认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者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家思索、探析的轨迹。

《猫打球商店》创作于一八二九年，发表于一八三〇年四月，原名《光荣与不幸》。一八三〇年出版的两卷集《私人生活场景》，第一篇小说是《家族复仇》；到《人间喜剧》正式出版时，本文移至《私人生活场景》之首。

这是巴尔扎克最早描写资产阶级经营活动和家庭生活的作品，其间的形象与后来面目可憎的资产者大相径庭。勤劳、节俭、狡诈、守旧，苛刻而不失敦厚，注重实利却尚未泯灭人情，表现了七月革命前作家对老式工商业者的温和态度。

发生在这个家庭中的婚姻悲剧，体现着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情感生活、道德观念的复杂性。画家的闯入，给这个保守而乏味的家庭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某种诗意；少女的一见钟情，意味着对新的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画家的才

情，给少女以“光荣”，更为她准备了“不幸”。前者的浪漫与后者的狭隘，前者的才华与后者的无知，前者的虚荣与后者的纯朴……正是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小家庭的毁灭和奥古斯婷的早逝。“在幽谷里开放的寻常而朴素的花朵，如果移植到和天空太接近的地方，移到有暴风雨和炎热的阳光的地方，也许就要死亡。”巴尔扎克颇有深意地强调了跟上时代潮流的必要，也含蓄地批评了实业资产者对艺术的愚昧。

还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扎克在这篇小说里已显露了他作为“风俗画家”描绘景物的出色本领。摇摇欲坠的老宅，怪模怪样的“猫打球”招牌，又窄又长的木窗，光线幽暗的店堂……自然而然地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封闭过时的“规定情景”。

《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的名篇。它最早发表于一八三〇年三月六日的《时髦》杂志上，题名为《高利贷者》，同年收入集子时改名《行为不端的危险》。此时作品的主题与作家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重心在于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同时也并非无情地批判了资产者的金钱欲。但在—八三五年作过重大修改的稿本中，镜头的焦点就完全对准了高利贷者高布赛克，篇名也相继改为《高布赛克老爹》和《高布赛克》。一个嗜金成癖、残忍冷酷、至死不悟的吸血鬼形象便带着满身的铜臭味进入了《人间喜剧》的画廊。高布赛克是社会舞台上的强者，人们“命运的主宰”，“无人知晓的国王”。因为“生活”就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黄金”就是“目前社会的灵性”，因此，金钱便可化为权力，拥有财富的高利贷者便能轻而易举地控制整个社会。时势造英

雄，金钱法则的确立，社会风气的毒化，才为高布赛克们提供了大显神通的用武之地。无论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巴尔扎克总喜欢用犀利的目光透视人物背后的社会。

高布赛克是一个卑鄙的胜利者，物化的灵魂，“黄金的化身”。除了金钱的力量，他不相信任何原则，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任何是非道德观念。“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实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了人间的一切力量。”在鲸吞雷斯托伯爵财产的过程中，他胸有成竹，干得得心应手，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也展露了他的卑劣灵魂。他就象是一只布好了蛛网的老蜘蛛，从容不迫地等待着落入网中的猎物。惟其如此，就越发显出其力量的可怕。

但是，和他的后来者相比，高布赛克还只是个原始积累型的资产者。他只靠单一的赊放高利贷方式搜刮财富，而不懂得资本周转的重要作用；在生活方式上，“只有进，没有出”，过着难以想象的穷酸的日子。因此，在他的遗物里，从贵重的金银财宝，到腐败的臭鱼烂虾，应有尽有，令人咋舌。贪婪和吝啬成了人物的本能，聚敛财富就是生存的唯一目的，高布赛克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灵魂，毁灭了自己的幸福。巴尔扎克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和嘲讽是不留余地的。《高布赛克》的创作和修改，表明作家对资产者“唯钱是亲”本质的认识在步步深入。

就个人好恶而言，在《人间喜剧》众多的作品中，我并不十分喜欢眼前的这篇《纽沁根银行》，就象与巴黎喧闹的交易所相比，我更偏爱卢森堡公园一样。然而，要想真正了解巴黎的

全貌又不能不进入交易所，同样，要想真正认识巴尔扎克，真正认识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也不能不读一读这篇“描写当代怪现状的杂录”。

巴尔扎克的小说素以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精确描写著称。他相信经济的制约作用，喜欢从对财富的占有中寻找人物行动的依据，也擅长大量运用经济数字来说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风云多变的金融市场为题材的《纽沁根银行》，极其鲜明地显示了这种经济学的特点。这也是巴尔扎克开掘深入，并能常有预见的长处之一。

纽沁根是《人间喜剧》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他属于法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银行家之列。一八〇四年，他即开始染指证券市场，但不过是尔尔之辈；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垮台后，他名声大振，纽沁根银行已在银行界高踞首位；到了波旁王朝末期，人们已不得不承认他是“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七月革命之后，他不仅拥有巨额财产，而且被册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获得了荣誉团大勋章。“在当代，纽沁根银行的崛起算得上一大奇闻。”奇则奇，然而却是事实。由萌芽到发展，由经济而政治，金融家势力的不断蔓延扩张，并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纽沁根的发迹艺术地体现了这一历史趋势。

“金钱的世界从此狼烟四起了。银行家征服别人，牺牲千万人的性命，谋的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士卒就是许多顾客的个人利益，他运筹谋划，设置埋伏，调兵遣将，攻城夺地。”在这场残酷的争夺战中，纽沁根韬略在胸，胆识过人，诡计多端，

无仁无义，既洞察经济行情，又善观政治风向，因而能从容自如地成为角逐中的胜利者。

巴尔扎克一方面揭示了金融家得势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胜利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他无所不能。金融界这头巨象能把议员卖给政府，把希腊卖给土耳其。”在金融市场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假象，散布谣言，在假倒闭中渔利，使多少人一夜之间便倾家荡产。

在这幅“巴黎生活场景”中，巴尔扎克不仅继续表现了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经济优势，而且进一步写出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倾轧争斗。贵族子弟博德诺的穷困，银行家阿尔德里热的潦倒，商业资本家葛朗台的破产，……都直接间接地与纽沁根相关。他三次倒帐清理的阴谋，更不知波及多少商号企业。其掠夺的规模、狡诈的程度，影响的范围，都是高布赛克、葛朗台之辈所望尘莫及的。

《纽沁根银行》构思于三十年代初，创作于一八三七年，发表于一八三八年，距离一八四八年革命还有整整十年。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史来看，银行业大规模发展，以致成为左右经济命脉的巨大力量，大约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巴尔扎克以艺术的图画敏锐地预示了这一历史前景，并明确指出：“不久你们就能看见，贵族老爷、朝中权贵、部长大臣黑压压一大片涌来搞投机活动，他们的爪子比我们还会捞，他们的主意比我们的还要弯弯绕……”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尔扎克的这一天才预见性：“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还不

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三世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①

在论及资产者形象的这一部分里，把《红房子旅馆》放在最后来讨论，我想是符合巴尔扎克的思路的，尽管它发表于较早的一八三一年八月。因为，按照作家的意图，《风俗研究》旨在“种种效应中来描绘社会”，而《哲理研究》则是要“考察其原因”（参看达文的《〈哲理研究〉导言》）。《红房子旅馆》是和《驴皮记》等名著一起首批收入《哲理小说和故事》里的一个重要短篇。它对资本的本质和社会道德沦丧的深层思考，确实达到了哲理的高度。

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平常之极；一段靠杀人越货发迹的历史，也并不典型。但独具慧眼的巴尔扎克，却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力，对这个平凡的题材作了不平凡的开掘。

巴黎屈指可数的银行家泰伊番发迹的秘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滩血”，他的任何幸福都是“罪恶的果实”。而且，正如律师所说：“如果都去追寻我们家产的来源，我们都将落到什么地步？”这就形象地告诉人们，对于这些体面的资产者来说，只能承认现状，却不能追究历史。不论他们是否亲自动手杀过人、抢过钱，但只要掀起过去的一角，就会使他们统统失去“立足之地”。资本就是赃物，资产者就是杀人犯，小说留下的客观结论多么尖利，多么惊人！

精彩的一笔，是“良心裁判所”的辩论。落墨不多，却大大

^① 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6页。

深化了主题，余味无穷。

“良心裁判所”荟萃了“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聚集了“一切社会舆论、道德实践的代表”，其中有成熟的政治家，纯真的年轻人，深谙《法典》的律师、法官、公证人，还有英国的外交官和清教徒，恰似上流社会的缩影。在他们围绕“我”是否应和泰伊番的女儿结婚这个“高级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展开讨论时，由于同根相连但又想装扮成正义的化身，既不愿赤裸裸地为杀人罪行辩护，又不愿否认非法掠夺财富的合理性，于是，在两难的窘境中迸发出一句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妙语。小说的最后一句是：“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其含义是：谁让你自寻烦恼，非要证实泰伊番就是那个谋财害命的杀人犯呢，否则，你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那份罪恶的财产了吗？

这是对社会的裁决、对社会良心的裁决。如果说泰伊番自责而亡还有着道德批判的痕迹的话，那么“良心裁判所”的批判则深入到社会心理的深层，揭示出罪恶社会的痼疾难除，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升华。

《红房子旅馆》，以“叙述中的叙述”，取得了出色的戏剧性效果。全篇以“我”为叙述者，中间插入德国商人讲述的“恐怖故事”，故事的听众之一正是故事的主角泰伊番，而“我”在听故事时始终注意着泰伊番的表情动作，“我”由于发现了泰伊番的反常而穷追不舍，最终证实了他的预感，却使自己落到了尴尬的处境……巧妙的结构，使小说妙趣横生，更使人物的微妙心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第二部分的对话，处处与人

物身分相吻，句句是微言大意，充分表现了巴尔扎克用语言描写人物的天才。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这一称谓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但是，如果我们依此便把作家紧紧地规范于现实主义圈内，以为他的创作只有单一的再现风格，那就大谬不然了。正象许多文学巨匠一样，巴尔扎克的笔底是多姿多态的，他从不作茧自缚、将自己的创作定于一尊。

巴尔扎克长于观察，也富于幻想。一位缺乏想象力的作家，是无法构筑起这样宏大的艺术殿堂和勾画出数以千计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因此，在读到象《长寿药水》、《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等小说时，使我们感到惊讶的，并不是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竟能写出情节如此荒诞、色彩如此奇异的作品，而是巴尔扎克将浪漫风格与哲学思考结合得如此巧妙的卓越才能。这也是他“出于浪漫、而又异于浪漫”的独到之处。《人间喜剧》的作者，把这一类作品统统归入《哲理研究》，恐怕不是偶然的。

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永生的渴望，似乎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弱点。《长寿药水》(1830年10月)中，唐璜父子对“死而复生”的追求，本无可谴责。

但是，通过父子两代“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怪诞故事，一个人间恶魔的形象清晰地突现在人们的眼前。